



大家风采

名人书坊（上）

甘丹 李波 孙敖/编

远方出版社

大家风采

名人书坊(上)

甘丹 李波 孙敖/编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戈 弋

封面设计:逸 飞

大家风采
名人书坊(上)

编 者 甘丹 李波 孙敖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鸿鹄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400
字 数 4600 千
印 数 5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059-2/1·21
总 定 价 1000.00 元(共 40 册)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前 言

在每个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话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刻影响了你或者能够激起你的共鸣，使你有所感悟并让你得到一些人生的启迪。

自古以来，世界上的人有过多少，恐怕难以数清，能称得上“人物”的毕竟是少数；说是“大人物”，称得上大家的，更是屈指可数。世界性的“大人物”，有东方的、西方的，有政治、经济、科学、思想等各个方面的。“大人物”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就是一部历史，值得我们去探讨。很多人在青少年时期不是很崇拜心目中某一个或几个“大人物”吗？不是从了解中汲取了力量吗？这就说明，在书中与这些“大人物”相识，能使我们开阔眼界，丰富知识，增强自信心和分析能力，摆

脱幼稚而走向成熟，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大步前进。

《大家风采》是一套收集著名文学家、伟大的革命领袖、著名法庭辩论的经典语录。它完整而简练、多面而重点、准确而生动地记述了一些人生的感悟，希望能够帮助的成长路上困惑迷茫的青少年朋友们。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疏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目 录

我和书的故事.....	(1)
书 缘.....	(5)
断章取“艺”	(35)
书海遇合	(39)
我读了这样一本书	(43)
读书与著书	(50)
四十年磨一书	
——关于《早年毛泽东》的写作与增订	(53)
从铭刻在心的印象说起	
——关于《吴晗传》	(63)
书缘纪略	(76)
祸福与藏书	(84)
书之恋与书之累	(86)
读书苦与读书乐	(89)



名人书坊(上)

我的珍本莎剧	(92)
谈谈读书习惯	(96)
书的征服	(106)
书累记	(110)
日坐书城	(125)
跟《小布头奇遇记》的奇遇	(129)
生命之永恒的惊奇	
——读《泰戈尔评传》	(148)
有一个爱书的人	(156)
生命与书	(163)
为一个好人作传	(175)
岁末	(179)
读书二题	(184)
偷书	(205)
人和书的命运——兼怀亡友从农	(210)
书谜三题	(217)
编完一百期	(225)
焚书记	(229)

名人书坊(上)



书 恋	(233)
书 香	(238)
翻书的滋味	(241)
我的读书流水帐	(248)
老 板	(254)
恩 师	(263)
小 书	(268)
书 痴	(273)
毁书六记	(278)
我的读书生活	(283)
谁解其中味 ——我的读书态度	(289)
购书归来写题签	(294)
书卷与我共此生	(299)
悠悠读书情	(305)
从“书生”到“老夫子”	(308)



我和书的故事

张岱年

我喜书,喜读书、买书,更喜著书。青少年时期,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地近琉璃厂,下课后常和同学到琉璃厂旧书铺浏览。那时,琉璃厂旧书店很多,每个书店都陈列了很多古书,可惜我没有钱,无力购买高价的书。当时宣武门内路西头发胡同有一个小市,小市中也有几家书铺。我路过宣武门,常到小市旧书铺看看。我喜读《庄子》,也喜读宣颖的《南华经解》。当时家里有一部清初刻本的《南华经解》,比较破旧。在小市书铺中见到一部精刻本的《南华经解》,惜乎无力购买。(直到30年代,买到一部精刻大字本的《南华经解》,珍藏至今。)我记忆犹新的是在小市书铺中遇到一部《庄子》,题“郭象评、向秀注”,是一部木刻本,不知是何人伪作。也因



名人书坊(上)

无钱没有买下。后来再也不见了。

30年代,我在大学任课,稍有闲钱买书。留心购求《张子正蒙》的各种版本,买到高攀龙的《正蒙释》、刘玘的《正蒙会稿》,都是明刻本。又买到《张子全书》的几种不同版本。当时许多收藏家都注意搜求诗词小说一类书,对于理学书很少有人注意。我则主要购买哲学书籍。50年代初,我请琉璃厂书铺的魏广洲同志寻找明代哲学家王廷相的《家藏集》,他为我找到了,共六函,印刷装帧都精美。据闻北京的《王氏家藏集》只有两部,一部存科学院图书馆,一部由我购藏了。后来友人王孝鱼同志受中华书局委托标点《王廷相集》,即借阅我所藏的进行校勘。老魏同志又为我买到一部明版《李太白集》,亦甚为精美。我还在琉璃厂买到清代中期谢刻本的《荀子》,嘉庆年间吴鼐重刻宋乾道本《韩非子》,都十分精美,令人看起来怡心悅目。我看过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知道宋元刻本的精美,惜乎无力购求,只能到图书馆善本室参观了。

我所见到的明刻本及清代乾嘉时期的精刻本,都十分精美,实乃一种价值很高的艺术品,是文化瑰宝。惜乎只能买到二三部,现在更是难以



再遇了。40年代至50年代初,北京饭店楼下有一个法文书后,卖外文新书。当时我也常到法文书店,买过一些英文哲学书,十分方便。后来这个法文图书因故被封闭了。50年代后期,很难买到外文书籍了。现在看来,从文化交流来说,这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买书不易,存书亦难。40年代我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有时住房也很小,后来迁到新林院,有一间很大的书房,颇为方便。1952年迁到北京大学中关园住宅,建筑面积75平方米,居住面积不过30多平方米,比较窄小。当时购书不多,勉强够用。在“文革”期间,学校让75平方米的房屋两家改为3家,每家建筑面积50平方米,书籍就放不下了。后来哲学系文革小组还嫌我们住房太大,命令我从50平方米迁移到二公寓的一间半的小屋,书籍更无法存放了。迁移时我只好卖出了4辆平板三轮车的书,但存书仍然嫌多,只好堆积在半间屋中。当时也不允许多读书,“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正在流行,哪个还敢看“封、资、修”的书籍呢?其后逐渐落实政策,我的住房由一间半改为两间,1978年又由两间改为名义上的三室一厅,实际是二间半和一间小厅。书籍勉





名人书坊(上)

强存放,找起来非常困难,又兼年老体衰,无力多买书了。偶尔到琉璃厂旧书店游览,难免望书兴叹。因为没有放书的空间,也就轻易不买书。有时想起清末学者孙诒让、现代史家陈垣先生都有几间大书房,不无羡慕之意。明知其不可求,也就安于陋室了。现在年过八旬,有时取出明刻及清代精刊,观览一番,也就很满足了。

清代思想家颜元(习斋)讥讽宋明理学家,说宋明儒者只会“读、讲、著”,意在对于书呆子痛下针砭。其实理学家除了“读、讲、著”之外,也还在考察、思索。如周敦颐、程颢以及朱嘉、陆九渊,也都长于吏事。我的一生似乎是在“读、讲、著”中度过,其实我是力求贯彻“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我写了一些书,幸而都能问世。40岁前所写的哲学论稿,题为《真与善的探索》,1988年由山东齐鲁书社出版了。30岁前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近年来也一再重印。前后出版了十几种书,实可庆幸。“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还想继续写。虽然无力买更多的书了,但是对于书的感情还是一如往昔。

希望出版界多出新书、好书,在印刷上超过乾嘉时代精刻本的书。



书 缘

牧 惠

一、借书

“书非借不能读也”，这是袁牧的一句经验之谈。

一般来说，借来的书，迟早总得还人，“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见之矣”，所以，借来的书总是挤时间抢先读完。相反，自己花钱买来的书，插进书橱之后，心想早晚总有机会，往往放了很久都不曾读。就像长期住在一个城市的人，总是不如偶然路过的人那样玩遍当地的名胜古迹，及至调动工作了，才突然想起竟有好几处该去的地方未曾去过。

我八九岁开始读课外书，大半是小说，而且



名人书坊(上)

是大达图书公司出版的廉价剑侠小说和扫叶山房出版的石印本《济公传》之类神怪传奇。穷小子没钱买书,都是求人情从同学那里借来的,除了必须保证按时还书之外,还得干些譬如替书主人写几张大字应付老师之类“义务劳动”以作补偿。姐姐也迷这些书,为了赶时间,我们常因为耽误正事而挨母亲训斥。有一天,路过基督教福音堂,见旁边那间不足十平方的小屋新挂上了文化站之类的招牌,好奇地进去看看。屋里有几份报纸和大约二尺来长的一排书。高兴极了,马上逐本地翻看究竟有哪些可读的书。居然有一本小册子是史沫特莱的《毛泽东自传》,那惊喜不啻于哥伦布在航船上发现前面竟是一块陆地。

这里得解释一下。少年时代,我在广西一个小镇度过。那时的广西,在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统治下。不管真也好,假也好,他们比较开明,所以才能让街道文化站居然有一本宣传共产党大人物的书。那时,我当然不懂得共产党同国民党孰优孰劣,但是,蒋介石、毛泽东这些“猛人”的名字我从老师那里听到过。出于好奇,我坐在条凳上读完这本小册子,头一次接触了另外一个新世界。



再过几年,考上中学。这间开办了将近 20 年的县立中学藏书相当丰富,不仅有鲁迅、巴金、茅盾、邹韬奋,而且还有马克思、托洛斯基、布哈林,让人大开眼界。从此,我向剑侠小说“拜拜”。初中一年级我特别喜欢邹韬奋的《萍踪寄语》;接着就是巴金的《家》、《春》、《秋》;经过老师讲解,我又喜欢上鲁迅和茅盾。按物质生活说,我们(特别像我这样的幼年丧父,全靠母亲做手工养活的穷孩子)比现在的少年苦多了;但是,那时的老师并不必为什么“升学率”伤脑筋。他们上课前认真准备,自修课时绝不让我们松散。除此之外,就是我们的自由天地,喜欢看什么课外书就看什么课外书。寒暑假的作业不算多,除了帮母亲干活和按规定做完作业外,还可以读不少课外书。特别是上了高中之后,图书馆的老师对我们格外优待,每次借书不限一本,假期也同样开放。马克思、布哈林的书,本来放在禁书那格,我们也蒙恩准借回去囫囵吞枣地读过。布哈林四本一套的《唯物史观》,我们委实读不懂,硬着头皮一页一页地啃,另有一番情趣。假如这些书是我的,放在书柜里,我肯定不会读它。——当然,既然读不懂,根本不应该好高骛远去硬读,这里只



是想说“书非借不能读也”的一种乐趣。在这种乐趣中游泳书海更是得益匪浅。

离开母校将近半个世纪了。对母校的图书带给我的恩泽,始终念念不忘。前年听说,在“文革”中,这些“封、资、修”都在“革命”声中变成纸浆,心里对这种煮鹤焚琴的罪孽难过了好些天。

二、书劫

想读书,不能全借,总得买书。于是,除了读书乐之外,还有藏书乐,接着又必有失书苦。

读中学时是穷学生,解决生计已经难上加难,虽然仍然千方百计地凑钱买书,老师和报社的编辑(我向他们投稿)也送些,到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存书也就是那么一小摞。考进广州中山大学后,情况有了改变。我是公费生,吃饭不必操心。投稿的命中率也高了,于是,我每月总有一个星期天进城,头一件事情是去报社取稿费,然后直奔文德路旧书店,一间一间地浏览。这些旧书店存书相当丰富。不知什么缘故,刚在新书店出现才几天的书,这里就可以用六七折的价钱买到。30年代的书,有的是,也不贵。一般的线装



书我们也买得起。于是,当1948年夏天奉命撤退去香港报到时,我已经有一木箱图书了。这些书带不走,也不好托人带回家里。我把它们同别的行李全寄放在一位同学那里。

从香港进了游击区后,没书可看简直是一大苦恼。幸好那时在香港有一位同学,因腿脚不便而无法入游击区。临走时,我把几篇稿子放在她那里。她把我写的两篇小说和一篇翻译的童话送去发表了,得了一笔稿费。在彼时彼地,这可是一笔可派多种用场的财富。我要求她把其中一部分买书给我。后来,在一个交通站里发现一大堆过往行人留下的各种书籍,大喜,尽力而背地取走了一些。书多了,行动不便,我把它和一些冬天的衣服寄存在古合江村契娘家里。

人要倒霉起来,真是毫无办法。不久,契娘家失窃了,我存在那里的一藤箱东西无影无踪,两件毛衣是母亲给我织的最值钱的财产,对小偷确实有用,也还罢了;书,以及发表了我的作品的杂志报纸,对他有什么用呢?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时我还不晓得,也是这个时候,特务到中山大学进行了一次大洗劫,我寄存在同学那里的全部行李也遭了难。